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 ——首册《香港志》大事记读后

2020年12月，《香港志·总述 大事记》正式出版。这是多卷本香港地方志的首部分册，甫经问世，就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其中，香港大事记共计47万余字，编纂者广征博采，披沙沥金，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认真梳理和全面记载了七千年来在香港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其搜罗之全面，记载之详尽，考据之严谨令人叹为观止。承蒙香港地方志中心厚爱，将此鸿篇巨制馈赠于我，并约写书评。抱着认真学习的态度，初步浏览了《香港志·总述 大事记》的大事记部分（为行文简便，以下简称《港志大事记》），在这里把自己的一点心得体会与同行们交流。

### 一、编纂团队新老搭配，专家修志保证质量。

与内地官修志书的模式不同，香港采取“政府支持、社会参与、专家修志”的民间修志模式。而采取后一种模式，对修志者的学识水平、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据媒体介绍，香港志的编修团队中，有香港史专家、出版社资深编辑，也有热心修志的年轻大学生。他们精诚团结、密切协作，搜集、整理出香港上下七千年的五万多条大事，并从中精心筛选出6000多件大事入志。为了确保质量，他们广泛征求香港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术界的意见，经过反复修改、不断打磨才最终定稿。（《香港志》：以历史之炬，照亮香港未来，新华社香港2021年1月17日电）

而我本人在与香港地方志同行的接触中也了解到，《港志大事记》

的三位主编中，丁新豹博士是香港历史博物馆前总馆长，香港中文大学荣誉高级研究员；陈佳荣是出版社资深总编辑、岭南大学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荣誉研究员；刘蜀永教授是著名香港史专家、岭南大学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高级研究员。大事记的撰稿和编辑人员是一批青年才俊。而由 28 人组成的大事记专家顾问团队，则包罗了香港和内地的政界、学界的知名人士和学者。这种老中青三结合的修志队伍，不仅能充分发挥专家之所长，也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社会各界的力量，保证了志书的学术性，也有利于新生力量的培养和锻炼。

## 二、未雨绸缪，制定详细的编纂方案。

由于志书采取众手修志，因此在修志之前必须拟定周详的编纂方案以便大家共同遵守，这是古今修志者的普遍做法。但是香港同行拟定的修志方案，是我所见过最详细的方案。据香港地方志中心编辑部总监孙文斌博士介绍，为了统一大事记的选题标准，确保大事不漏，要事突出，他们在动手编辑《港志大事记》之前，就拟定出详细的《〈香港志·大事记〉编辑手册》。翻开孙博士赠送的这本 68 页的《手册》，它由五个部分组成：（1）缘起；（2）编纂目标、方向和原则；（3）记载范围；（4）详细的选事标准和系年原则；（5）行文规范。其中，在“大事记编纂方向”上，提出要考虑多元期望和突出香港特点。所谓考虑多元期望，就是“要考虑本地、内地和国际三方的认受性，以彰显香港的特殊性。”其中，“本地”是指能体现香港人“集体回忆”的大事；“内地”是以国家大事为框架的香港大事；“国际”是指能突出香港作为国际城市的大事。在如何突出香港特点方面，《手册》从香港的历史

和社会特点出发，归纳出八个特点，即：民主和法治精神；一国两制的试点；中国现代化先驱；全球化的重要枢纽；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人才和人口流动的集散地；国际金融、贸易、航运、资讯中心；内地和海外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互借鉴的平台。此外，《手册》还提出了大事记编纂的六条原则：一是存真求实；二是述而不论；三是越境不书；四是坚持标准；五是常事不书、非常则书；六是选精择要，去芜除杂。

《手册》的第四部分，即“详细的选事标准和系年原则”，共有 57 个页码，占《手册》80%以上的篇幅。它将拟入志的大事，按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其他，归类于六大类 51 个分类，每一类都制定出有针对性的选事标准、系年原则和编纂原则。兹将地理部类的“人口”分类的编纂方案摘录如下：

## 一、地理部类

### 2. 人 口

#### (1) 人口普查（系于普查开展的时间。记普查范围、结果等）

△ 记第一次人口普查的开展和结果

△ 记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不记中期预测统计

#### (2) 人口统计数据（系于公布的时间。记发布机构、结果等）

△ 记突破性的人口数据。如 100 万、700 万等

△ 记特别或重要意义的人口数据。如 1850 年代广东动乱带来的人口变化；日占时期的人口普查；第一次少数族裔统计；第一次水上居民人口调查等

△ 国际权威机构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系于统计数据公布时间。记发布机构、统计机构、结果等）

·全球人口密度调查,香港排最高位的第一次(2017年第三名)

·全球人均寿命调查,香港排最高位的第一次(2015年第一名)

·人口老龄化调查,香港老龄人口比例历年最高的一年(2017年)

(3) 记重要的人口政策和措施（系于政策和措施的实施时间。记政策和措施的内容等）

△ 人口登记政策和措施。如《1844年人口登记条例》《1846年人口登记即户口调查条例》《1949年人口登记条例》等

△ 出入境管制措施。如《港九地区人口疏散实施要领》《关于往来香港、澳门旅客的管理规定》、出入境管制站的管理、电子出入境信道等

△ 人口管理组织或单位的成立。如户口统计筹审司署、人口政策专责小组、人口政策指导委员会、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等

△ 身份证的签发和换发出入境证件的签发：回港证、回乡证、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特区护照等

△ 重要人口政策文件。如《人口政策专责小组报告书》《集思港益》等

像上面这样详细的选事标准、系年原则和编纂原则，在《手册》对六大部类 51 个分类都有具体的规定。可以看出，《港志大事记》的编者在事前做足了功课，对香港地情作了充分的研究和精准的把握。

### 三、承前启后，守正之中又有创新。

《港志大事记》的记述时限，上溯公元前四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下迄2017年7月1日，总共收录大事6514条。而收录的重点是1841年英国强行占领香港，到2017年7月1日这177年，共收录大事6167条，占全部大事条数的94.7%，平均每年34.8条。其中，大事最多的是1997年，共收录大事156条；最少的是1876年，仅有3条大事。从各年份大事的数量变化看，1937年是一个分水岭，从这一年开始，年度大事首次突破30条，达到36条。此后每年的大事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仅有1939年（30条）、1940年（19条）、1943年（23条）和1944年（18条）四个年份低于34.8条的平均数。从以上各个时期、各个年份大事数量的变化，不难看出编纂者“详今略古，相近略远”的修志理念。

通览《港志大事记》，感觉资料翔实、取材精当、语言简洁、行文规范，堪称志书大事记的精品。真正做到了“在继承中国修志优良传统的同时，突出香港特色，力求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

（《香港志·总述 大事记》凡例）以下四个方面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

一是记载全面。一般的志书大事记往往偏重于政治方面，而《港志大事记》的内容，涵盖了香港古往今来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篇大事记在关注革命、战争、经济建设、社会运动等宏大叙事的同时，也把视角投向底层民众，关注社会民生。如明代之前的林、陶、邓、吴等族群来港定居及其支脉的繁衍；吉庆围、龙耀头老围等早期氏族的围村或村落的建立；屏山

邓氏宗祠、愈乔二公祠、文氏惇裕堂、陶氏五柳堂等重要宗族祠堂的兴建；以及鼠疫、霍乱、天花等烈性传染病的爆发；还有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的自然灾害、事故，如甲戌风灾、海上学府火灾、西贡南边围旅游巴失事侧翻、港铁纵火案等。

二是图文并茂。《港志大事记》采用了 370 多幅随文照片，平均不到 3 页就有 2 幅照片，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而这些珍贵的历史照片，与文字记述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甚至起到了文字无法取代的作用，大大提高了志书的史料性和可读性。其中，中环邮政总局大楼启用（1911 年），盟军 B-24 型轰炸机轰炸九龙船坞（1944 年），维多利亚港俯瞰（1953 年），启德机场落成（1958 年）等一些照片，有的采取满版设计，有的甚至采用跨版，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

三是文字严谨。《港志大事记》的文字十分严谨、规范，绝少冗长累赘的词句。仅举一例说明：通常志书大事记在遇到同一日有两条或两条以上事件的，往往用“是日”“同日”指代具体的事发时间，并置于句首，每件事一个自然段。《港志大事记》则省略了“是日”“同日”，每件大事均另行起排。这样做读者并不会产生误解，同时使得行文更加简洁。同月、同年有两条或两条以上事件的，处理办法也与此相同。只有在同一天发生的两件（或两件以上）的事件是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的，才用“同日”。例如下面这条大事用“同日”则是很必要的：

1840 年 2 月 20 日 英国政府任命海军少将懿律和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懿律同时为英国赴华远征军总司令。同日，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向他们发出侵华的秘密训令和对华条约草案。

四是检索方便。在我以往看过的志书中，大事记在目录里都只标有一个页码，各个年份的页码是不标出来的。读者如果想查找某年的大事，从目录中是无法得到结果的，只有在内文中逐页翻检，既耗时又费力。而《港志大事记》在目录中用了三个页码，按年份列出页码。这样，读者可以很方便地找到自己要找的年份的大事，大大提高了检索效率。更令人称道的是，该书最后有五份附表，即《人名译名对照表》《官方机构和职称译名对照表》《条例和文件译名对照表》《其他外文译名对照表》《专有名词简全称对照表》。这五份附表一共占据了60多个页码。它们把正文里出现的专有名词、中外译名或按照笔画，或按照年份进行编排，既方便了读者查考，也提升了志书的学术品位。此外，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与一般的大部头工具书不同，《香港志·总述 大事记》的书签带不是一根而是两根。我们看书都有这样的体验：如果想对书中前后两处内容进行对照的话，有两根书签带就会觉得特别方便。该书的编者以人为本，处处为读者考虑的细心和贴心由此可见一斑。

总之，《港志大事记》是我读到的最优秀的志书大事记之一。正如董建华先生说的，通过修志，“全面整理本港自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人物的资料，为国家和香港留存一份不朽的文化资产，以历史之火，照亮香港的未来。”（《香港志·总述 大事记》序言）我相信，香港的修志同仁一定能不负众望，其他各册也将在不久的将来顺利出版，为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然而，数十万字的大事记也难免有白璧微瑕。笔者不揣浅陋，就

《港志大事记》个别需要商榷之处提出来探讨。

1.个别数据前后矛盾。例如，1941年的香港人口数据，就有164万（1941年）和144万（1942年9月18日）两种说法。1961年的香港人口，也有3129648人（1961年2月11日）和320.95万人（1962年）两个不同数据。

2.对已经有明确结论的事件，应立场鲜明地写明原因，不能采取纯客观主义的记述方法。

1955年4月11日 印度航空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包机由香港前往印度尼西亚雅加达途中爆炸坠毁，机上16名乘客及机组人员丧生，包括多名准备参加万隆亚非会议的中、越外交官及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仅三名机组人员生还。“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案”事后经过中英两国共同调查，查明是国民党“保密局”特工用重金收买香港机场工作人员，在飞机上安放定时炸弹导致了这场悲剧的发生。尽管《港志大事记》在1955年4月12日条，记载了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蒋介石和美国特务分子”制造了这起事件。但是笔者认为，作为大事记“五要素”之一，Why（何因）是不可或缺的。建议在4月11日这条大事记中直接点明“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案”的幕后主谋。

3.个别随文插图含义不明。1922年3月6日的一条大事，写港府撤销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为非法团体的决定。并于翌日将该会牌匾送回，同时释放多名被捕人士。为配合这条大事，用了一张大幅照片（图106），占了一整页。但是在图片中，“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



的牌匾被淹没在旗帜和广告牌当中，只是在三楼阳台上露出一角，不注意看很难发现。建议采取“大小图”方法，即把有海员总会牌匾的局部放大，叠压在大幅照片的一角，让读者既能看到牌匾发还的喜庆场面，又能看到发还的牌匾是什么样的。

4.个别句子表述不完整。2017年3月13日的一条大事记载：政协全国委员会通过行政长官梁振英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并实时就任。这一句中的“通过…当选”，句子成分不全。且当天会议并非增选副主席一项议程，所以不宜用“政协全国委员会”作中心词。建议改为：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上，行政长官梁振英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5.有些数字用法没有保持局部统一。

1929年3月11日 英皇爱德华酒店发生大火，被烧至倒塌，大火造成11人死亡、三人受伤。

1955年4月11日 机上16名乘客及机组人员丧生，包括多名准备参加万隆亚非会议的中、越外交官及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仅三名机组人员生还。

以上两条大事中的“11人”和“三人”，“16名”和“三名”都存在汉字于阿拉伯数字混用的问题，应该统一起来。另外，上面提到的1955年4月11日大事中，“多名准备参加万隆亚非会议的中、越外交官及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仅三名机组人员生还”一句中的“多名”二字多余，应该除。

6.个别大事出现遗漏。例如轰动香港的叶继欢械劫案有四条大事，包括抢劫、被捕入狱、重审减刑、越狱、再次被捕，记载得均很详细。

但是叶继欢在 2017 年 4 月 19 日因肺癌死于狱中则没有交代。

此外，分册出版的志书，其大事记分册是先于各册出版，还是待各册出齐之后最后出版，各有利弊。从有利的方面看，大事记先行出版，可以为其他各个分册提供历史脉络和线索，对各册的编纂是有好处的。但是，大事记涉及到本地区的自然、人文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在各分册资料尚未收集齐全的情况下，大事记的内容存在疏漏乃至讹误是在所难免的。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在修志启动之初，先拿出大事记初稿，提供给各修志单位和相关人员参考并征求意见。等到各分册出齐之后，再从中吸纳经过考证的丰富的史料，对大事记初稿进行增补、修订，然后再正式出版。

葛向勇

2021.04.20